

农村产业革命的政府逻辑与经验反思

——基于贵州实践的理性分析

罗贤贵 王国勇 李圳雨¹

【摘要】 本文通过对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政府逻辑与现实经验分析发现：政府主导下的“绩效考核”式农村产业革命，在理想逻辑与实践经验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政府主导下的超常规农村产业革命，在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增产增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农村、农业与农户的长期发展而言，自上而下推行农村产业转型发展逻辑也暴露出一些现实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绩效考核与目标体系制约下，对现有资源禀赋、农户需求和技术能力等缺乏深入了解；产业发展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农户主体性不同程度被忽视；快速调整产业结构带来部分产业重复、产品单一等现象存在，农户生计需求与长远发展存在潜在风险。

【关键词】 农村产业革命 政府逻辑 经验反思 农户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0)-11-0030(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农村产业革命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面小康，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既是推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抓手。农村产业革命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农户脱贫致富。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实施过程中坚持以“脱贫攻坚”为主要任务，紧紧围绕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和深入实施“五步工作法”，重点抓实抓细十二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林下经济，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对贵州农村产业革命中的政府逻辑与实践经验分析发现，当前农村产业革命推行的政府理想逻辑与实践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增产增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面临机遇的同时，农户生计需求与长远发展存在潜在风险。

一、农村产业革命的政府逻辑与地方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当前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实施农村产业革命对缓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产业革命的理性逻辑是通过宏观政策引导，结合各地资源禀赋与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传统农户单一农业生产种植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摆脱“贫困陷阱”，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内涵式发展。

1. 产业革命的政府逻辑

¹**基金项目**：2020年贵州省领导指示圈示课题“贵州超常规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举措研究”（编号：2020QS039）；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城镇化安置’移民的生计持续与社会融入研究”（编号：19GZYB1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贤贵 博士研究生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王国勇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李圳雨 硕士研究生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中国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与城市发展相比，仍然存在二元结构性差距。当前整个社会发展主要呈现两大突出特征：一是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不高；二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3]贵州地处西部偏远落后地区，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农户农业生产效益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城乡差距更为突出，“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影响和制约贵州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贵州山多地少，92.5%的土地面积为丘陵和山地，可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地无三尺平”“九山半水半分田”是贵州土地资源的典型性特征。贵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是全国扶贫攻坚重点关注的省份，全省贫困人口高达400多万，2016年国家级贫困县中贵州占到50个，占整个西部地区总贫困县的13.33%。2017年底，贵州全省贫困人口还有280万，截止2019年贵州仍有14个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人口中仍有80%以上依靠传统农业种植维生。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物质的贫困，贫困主要是经济的贫困，本质上也就是产业贫困。^[4]2018年初，贵州省提出“超常规举措实施农村产业革命”，既是脱贫致富的捷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助力全面小康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传统农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农户的需求与发展。开展农村产业革命，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是促进农户生计转型、改变农村贫困面貌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的长久战略。农村产业革命是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2018年贵州省提出“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产业革命的政策文件，突出产业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重点围绕茶叶等具有地方特色的12种主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工具嵌入到地方产业发展，为地方实践逻辑指明发展方向。以省级政府发出产业调整与发展目标及指标体系，形成自上而下的农村产业革命逻辑，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按照指标体系层层抓落实。一个产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一个工作专班、一个专家团队；践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五级书记”齐抓共管推进的组织领导机构，落实过程中通过相应目标绩效和考核体系，以超常规方式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从而达到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转型升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发展目标。

2. 产业革命的地方实践

自2018年实施农村产业革命以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引领下，通过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各级地方政府分级落实，紧密围绕12个重点特色产业，结合地方实际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不断完善农业农村服务体系作为联系农户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纽带，为农户在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过程中提供基本保障；实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油路、组组通硬化路；针对农村产业革命中技术短板问题，实施省级科技特派员、农技专家下乡制度以及基层干部包村包户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果苗、农药以及发放经济补贴等方式带动农户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改革传统农业种植方式，积极探索农业升级转型。同时，为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学校以及国有企业签订农产品销售帮扶订单，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产业革命实践中，贵州省六盘水市结合地方实际，不断探索，提出“三变”改革的农村产业发展理念，并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双“十二”模式，即“十二种”模式和“十二种”股权形式，把地方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特色城镇、景区景点和电子商务等结合起来，有效激发了农村创新活力，促进了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改革直接撬动131.5亿元社会资本参与“三变”改革，覆盖率达到72.3%。其中直接带动3883个贫困试点村参与改变，覆盖率达92.1%。实现试点村集体增加收益7.12亿元，人均增收353.15元、户均增收1354.92元，直接推动当地贫困农户实现脱贫目标。^[5]“三变”改革，连续三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全省实施农村产业革命以来，2018年贵州实现了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9%，位居全国第一；农村产业革命带动农户204万户788.2万人，人均增收2604.6元；其中带动贫困户45.5万户160.8万人，人均增收2348.4元。^[6]2019年上半年农业增加值935.22亿元，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保持全国前列，农村产业革命带来农村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在省级政策主导下，并由省领导亲自挂帅牵头的超常规农村产业革命，通过“组合拳”方式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农村产业发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升级。从贵州农村产业发展的纵向历史来看，此次产业革命给整个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效。但从农业、农村以及农民未来长远发展而言，当前各地实行的围绕12个重点产业推广落实，难免会导致产业结构布局存在盲目化、产业发展过度化、产业建设重复化以及产业实施形式化等问题。

二、农村产业转型的现实境遇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农的社会，农业是农户最重要的生计维持方式，单纯通过外在“资本输入”撬动农村产业革命，推动农村现代产业发展，突破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壁垒，在现实逻辑中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实践中，政策逻辑是从大局出发，通盘谋划，但在现实中，地方往往存在特殊性、个体性，这就导致宏观层面与微观之间存在偏离预期目标的现象发生，在产业革命中表现出产业转型面临项目经验验证不充分、农户对现代产业发展技术掌握不够、产业发展与农户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产业技术与项目管理存在后劲不足等现实问题。

1. 经验论证不充分，技术管理后劲不足

当前推行的农村产业革命，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下乡”模式。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企业带动型、合作社或大户带动型等模式，^[7]这些模式虽然能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但要真正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农村走上产业发展之路，必须要所发展的产业有可持续性。当前产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大多数地方都把重心放在打造亮点、凸显成效上。预期通过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建设为起点，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经营带动农户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过程中，资金补贴通过项目打包或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资金补贴一旦以项目形式或发给合作社，就变成了借助合作社的亮点来申请项目和资金，导致的结果是项目逻辑而非产业发展逻辑，^[8]难以公平地保障农户权益。当前农村产业革命因受制于“压力传导”机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产业发展与政绩效应紧密联系，围绕政绩工程，进行亮点打造，更倾向于把产业发展项目发包给“公司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对于势单力薄的小农户存在利益机会被忽视现象。在现实逻辑中，自上而下推行的产业革命在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项目规模化等方面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意志。部分地方政府在产业项目运作前对地方特性缺乏科学论证和认真考察，产业发展所要求的土壤情况、气候特点、人文风情以及技术支撑等经验验证不充分，当项目运作后，其具体运行与发展管理、技术、资金等后续支持难以跟进。虽然政府和技术方面有专门的技术特派员对产业发展技术提供支撑与监督，但由于存在地方技术人才缺口大、产业发展要求专业技术多元化、田间作业时间不固定等现实问题，产业技术仍然存在后劲不足。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农村产业革命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前期经验参考与借鉴，在产业布局、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互动协调不充分，在产业项目运作过程和监督评估环节存在专业性与规范化不够，“僵尸社”“虚假项目”杜而不绝。

2. 区位优势不明显，知识储备不够

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是小农户长期大量存在，补齐小农户小规模经营短板，是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9]贵州受地形条件限制，可耕地面积少且分散，农村产业革命讲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在武陵山区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本地区生产力较为落后，自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村产业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困扰和难题。^[10]贵州属多民族地区，长久以来，少数民族遵循顺应自然的农业耕种模式。农民在代际传承中熟练掌握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要求下的传统种植技术，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以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求为出发点。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村产业革命，农户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农业技能在现代产业发展上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的改造要以经济刺激、经济机会的差别为基础，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达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调动农民的获利动机和积极性来改造传统农业，这要求向农民投资以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利用新生产要素的能力”。^[11]产业革命不仅需要依赖农户个人拥有的物质和社会资产、有形和无形资产，更需要具备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与知识，掌握市场规律与信息，这些因素恰恰是在政府主导农村产业革命过程中被忽略的环节。

3. 对农户现实需求与发展能力认识不到位

实现农户持续增产增收是农村产业革命的基本目标，实践结果却受到地方、公司企业以及农户等“有限理性”制约，产业革命面临多重困难。从2018年、2019年经济增长来看，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实现了农业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从长期发展而言，农村产业革命不仅是对农作物的结构调整，更是对农户生计体系的改变。农村产业革命是把农户的经济收入、资产

以及生计等与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农户将面临承担未来不可预期性风险。产业革命效益能否真正嵌入到农户生计体系给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是我们始终关注的重点问题。^[12]政府作为非市场主体，如果在不了解市场与农户需求的前提下，自上而下推行产业结构调整，会忽视农户主体性与产业结构需求选择权。导致政府本应该是引导农户根据自身需求，结合市场要素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现实中农户却成为了农村产业革命政策实践中的“客体”，农户难以实现经济收入持续增长和资产的有效积累。合作社模式下，公司与农户之间往往通过口头协议，法律制约薄弱。当企业或合作社面临风险时，农户利益有可能会受到侵蚀，农户生计持续存在不稳定与危机。当农户经济收入来源存在不稳定、无法预估等情况时，农户不会把现有生计与未来发展联系起来，在这种生计“紧张”与制度“压力”状态下，农户与地方政府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与冲突。例如，产业革命推行中，部分地方政府把降低农户玉米种植面积作为产业革命中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政府便强制把农户已种上的玉米铲除，改种花椒、药材等经济作物，随即引发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新产业与地方资源、劳动力条件等不匹配，将会面临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背离发展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的初衷，出现目标靶向偏离问题。^[13]农户在产业革命中得不到实惠和收益，生理想性驱动下只能向外拓宽谋生空间。贵州是全国主要劳动力及人口流出大省，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县，其人口流出率高达25%以上。在土地细碎化、资源有限的贫困山区，农业收入本身难以满足家庭再生产的经济需求，如果农村产业革命不能持续实现农户经济收益，而使农户面临生计风险，尤其在农户不具备产业革命中要求的先进知识、技能以及管理经验时，不仅不能吸引劳动力回流，反而会加速劳动力外流的可能。近年来，像紫云、关岭等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净流出量均在10万以上，就紫云一个县连续多年流向宁夏的人口每年就高达3万多人。产业革命中自上而下的转型逻辑和“一刀切”行为，以及产业革命带来的现实收益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会误导农户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全面认识，这些都会影响农户参与产业革命的积极性，也会使产业革命实践过程偏离初衷。

三、农村产业革命的逻辑反思

农村产业革命有了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组织介入等支撑条件还是不够的，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走上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产业革命必须重视农户的主体地位，立足地方优势资源禀赋走因地制宜的农村产业发展之路。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十七条指出：“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4]因此，农村产业革命必须建立在三个重要前提之上：第一，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建立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产业革命。第二，必须满足农户增产增收，以农户为主体开展农村产业革命。第三，必须再造人力资本，培育农村产业革命领军型人才。

1. 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在传统农业生产发展的演变中，每一个村庄的形成都是社会与自然演变的结果，很多村庄的形成有千百年的历史，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规律。^[15]农村产业革命必须和当地的资源禀赋联系起来，因地制宜推行。从当前贵州产业革命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境遇来看，问题在于：第一，农业结构调整存在前期论证不充分，区域特色优势不强，品种特色不鲜明等问题。实践中，地方政府大多围绕省级领导负责带头的12种产业，各地区间产业布局缺乏因地制宜考察，种养出现规模性重复，产业发展模式与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产业发展从传统迈向现代产业化发展的早期，虽然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型效果，地方经济在短期内有了一个突破性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趋同产品纷纷上市，必然会带来货源堆积，形成产品滞销的严重后果。产业雷同发展必然带来市场竞争优势减弱，销售产品只能以压低价格来获得市场，形成相互压价的恶性竞争，难以立足长远。第二，政府主导下的“项目”产业化合作模式，企业或合作社包揽产业项目的初衷和动力主要看重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选择产业“示范点”“样板工程”上，优先考虑自然区位因素、交通运输、劳动力结构、地方资本等具有优势的村落，农户主体性与平等参与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产业政策拉大村域之间的现实差距。第三，非官僚制的“合作社”模式容易走向“异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没有有效地把全体农户全部衔接起来，只是项目覆盖区域内农户或土地资本加入，大量资本缺乏的农户或项目未覆盖的农户利益难以保障。这样一来则加大了区域分化和农户之间的经济差距。同时，受到市场影响，公司作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始终是站在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上考虑，当产业投入成本与成果收益发生矛盾时，企业肯定会首先满足自身利益，削弱农户权益，农户或将成为终极受害者。农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强，农产品品种和品质存在区域

差异。^[16]尤其是以果树、茶树等种植为主的农户，可能会导致复耕成本增加而放弃农业生产的可能，加重“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乡村产业发展好坏还涉及如何适应具有县域和乡村资源禀赋特点的涉农产业发展规律，选准产业、做好模式、优化发展等问题，从乡村产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发现和理解乡村产业发展背后的规律，是谋划乡村产业振兴的前提和基础。^[17]因此，产业革命要防止“资本下乡”带来的“趋同”与“异化”，必须要坚持“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理念，找准发展定位，选对特色产品。坚持产品优质多样化；产业发展多元化，产、供、销一体化；不断完善特色产业市场机制、重构产业链；运用“互联网+农产品”交易平台，推进网上交易的发展，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实现特色产业合理有序运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18]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应秉持“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以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根据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导向，科学规划，提升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等市场品质，打好“多彩贵州”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牌，开拓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发展。

2. 重视农户在产业革命中的主体性

政府主导下“产业革命项目化”发展模式，初衷是在政策引导下，通过“企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从而突破农户传统农业的生产弱势、组织弱势和市场弱势，以规模化的方式将农户引入到农业现代化、市场化以及产业化轨道上来。但其中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农户的生产主体性。农户是认识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农村社会的关键。生计维持是农户首先关注的重点，农户在进行经济社会交往、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和参与集体行动等问题上，通常都表现得十分理性，他们始终以投入成本和最后收益进行比较，试图达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农户真正关心的是各种投入要素中将面临的新风险，并由此接受或拒绝使用新生产要素。有研究表明，东南亚的传统农民是“理性小农”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做出农业生产行为之前会受到个人利益和家庭福利的利益驱动，将自身的行为置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框架中进行计算，农户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工具合理性行动”行为。^[19]当前农村产业革命采取由政府主导（或引导）下改变农户客体经济的行为，农户被看作客体存在，处于一种依附性地位，农户的产业发展受公司和合作社双重限制，是一种被动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农民在运用传统知识、面对资源要素如何分配时都表现得极度理性，可以说农民“首先都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20]农户已有的理性经济行为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适应当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以及文化习俗的一套生产行为方式。农业生产活动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将生产要素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农村产业革命必须坚持农户主体性原则，尊重农户的主体性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活农户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

3. 培育农村产业革命领军型人才

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产品消费，人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人欣赏和消费的农村产业注定不可持续；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产业发展，关键因素都离不开人力资本。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推动人才下乡……”，同时强调“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21]农村精英对农村产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是农村改革、产业发展以及农户生计转型中的引领者。帕累托指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取代的政治现象，是精英之间的流动，这种循环和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22]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从“人口输出”向“人口输入”的转型过程，大量农村劳动力及人口流向城镇地区，农村劳动力“换地区”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旧精英衰落与新精英流失的双重困境，农村产业革命面临领军人才严重缺失的现实困境。一方面，留守农村的老龄群体精英们受年龄、身体、思想观念以及知识能力等因素影响，无力承接现代农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80后90后年轻劳动力整体性流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导致精英群体断层，新旧精英人才交替困境。农村产业革命，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城乡一体化，必须实现再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农业产业发展、农户生计可持续的重要驱动力，产业发展领军人才是推动农村产业革命的第一生产力。因此，应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农村产业革命领军人才培育机制；完善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机制，吸引农村精英群体回乡创业、就业，实现农民职业转型升级；激励农户产业革命积极性，把农户主体性与农村发展现代性放入同一个框架；激发农户自身动力，培养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本土精英型

领军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可持续发展，让农民真正成为产业革命的创造者、参与者和受益者。

四、小结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和农业凝结着时代向前发展的动力。农村产业革命不仅仅只是政策的实施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与农户生计体系的调适过程。从当前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运作逻辑来看，仍然存在着预期目标与实现问题之间的矛盾现象，产业革命实践脱嵌于农户生产活动之外的社会事实。农业生产是农户关心的重要产业，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产业，农村产业革命中必须把“资本下乡”与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联系起来，注重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主体性、参与性与权益性问题，避免产业项目化导致的“绩效”目标与项目“空壳”现象。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政府应加大技术、资本、人力、服务以及管理等各要素的投入，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与农户主体性原则，结合已有资源禀赋持续推进，最终实现农户增产增收、多元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3-11-16.
- [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3][15][16]陈文胜. 中国迎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J]. 经济, 2018, (08).
- [4]陈文胜. 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J]. 农村经济, 2019, (09).
- [5]贵州农村改革助推产业革命创佳绩——2019年贵州省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综述[N]. 贵州日报, 2020-05-07.
- [6]刘悦. 贵州: 农村产业革命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N]. 贵州日报, 2019-09-24.
- [7]孙久文, 唐泽地. 中国产业扶贫模式演变及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2017, (06).
- [8]黄思. 引导与主导: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逻辑及其影响[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 (04).
- [9]陈文胜.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N]. 忻州日报, 2018-03-13.
- [10]高元武. 武陵山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基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马镇的调查[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2020, (03).
- [11][20]舒尔茨著, 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2]熊春文, 桑坤. 作物结构、生计体系与产业扶贫的有效性机制——基于华东一个县域的经验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 (03).
- [13]李博, 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 (04).
- [14][21]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J]. 新农业, 2020, (04).

[17]杜志雄. 充分认识产业发展规律促进乡村产业健康发展[J]. 中国发展观察, 2020, (03).

[18]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摘要[J]. 新农业, 2019, (06).

[19]马良灿. 理性小农抑或生存小农——实体小农学派对形式小农学派的批判与反思[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 (04).

[22]帕累托著, 宫维明译. 精英的兴衰[M]. 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 2010.